

反法西斯主义、自闭症与朋克乐的边界墙

由 LLM 翻译

moss williams

2021

令人作呕、粘稠的“Lebensunwerten Leben”（不值得活的生命）的雾霾仍然笼罩在我们所有残疾的怪胎身上，就像暴乱后的催泪瓦斯。“不值得活的生命”是纳粹的哲学，指导他们对残疾儿童进行毒杀实验，表达了优生学的自以为是的根本观念，这仍然是现代生活的基石。有一种普遍的氛围认为我们不应该存在，我们的存在是对政治体的尴尬，一个真正强大的volkskorp（民族共同体）不会让我们存在，破坏形象（和血统）。作为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奇怪的人，我发现我和我爱的人拼命地努力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曾经和我的同类一起参加反法西斯街头行动，在那里我们的痛苦、恐惧和愤怒只被媒体和公众视为表演。不要这么戏剧化。只是法西斯主义。安静下来。冷静下来。闭嘴。去死吧。

而我们确实死了。

我从来都不擅长社交方面的东西。朋克乐总是吸引我，因为它让我感到舒适，但我总是站在朋克乐的边缘，无法以正确的方式表达我的愤怒和不满，从而被接受。这种对外人的敌意在朋克乐内部感觉很安全，但常常被指向我。我申请加入朋克乐团体，但被拒绝，理由我不清楚，也不清楚他们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甚至不敢问。所以我最终落到了最暴力的地方：朋克乐的边界外。如果只是被忽视和怀疑，我还能忍受，但像任何边界一样，我的流放让我成为掠夺者的猎物。“我可以让你加入。跟我回酒店吧。”（我拒绝了；我的心碎成了千万把刀子。）

这种故事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很常见。神经多样性者。自闭症患者。我们在童年时期被迫否认自己的需求和冲动，这意味着我们往往无法理解“合理”的社交互动和不合理的社交互动之间的区别，因为在神经典型的社会中，人们对我们的期望已经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如果不是完全虐待的话）。在我的一生中，除了安静、有帮助、遥远和最重要的是服从之外，我的任何行为都被外界视为咄咄逼人、破坏性、冒犯性甚至疯狂的。任何轻微的挫折都被视为威胁。缺乏眼神接触被视为撒谎或恶意的迹象，但过多的眼神接触又被视为侵入性、可疑、令人毛骨悚然、危险的。在这个游戏中，我们不可能赢，因为规则是我们做错了，而在一个有警察的社会中，这往往意味着受伤、监禁甚至死亡。

即使是我学会的少数社会规则在朋克乐中也被完全颠倒过来。这是朋克乐的美丽之处，但也可能很困难。试图摆脱规则的企图往往只是一套新规则。这使得朋克乐空间对我来说很有压力，每个人都高度警惕可疑的行为。由于不理解社会规则，我表现得不明确，所以人们把我归类到他们脑海中的任何角色。当我迷路、写日记或独自吃饭时，我被认为是美食评论家、保安、妓女、女服务员、无家可归者、店员等等。保持低调是一种安全策略，但朋克乐和无政府主义者对操纵和渗透非常敏感，我的个人防御措施与他们的措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大多数人对周围的人的注意力不如他们意识到的那么多，友好而冷漠的态度和有目的的走路让我进入了很多门，但不是我真正想进入的门。人们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而偏执、歧视残疾、厌女的空间看到了威胁和欺诈。

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让我接触到了朋克摇滚乐。我在成长过程中听着 Ramones 和 Clash, 以及 PJ Harvey 和 Neil Young 的音乐。其中一首我最喜欢的歌曲是“Beat On The Brat”, 它的流行节奏和容易消化的重复旋律是 7 岁孩子愤怒的完美容器。非常刺激和有趣, 尽管显然不适合学校的才艺表演。这不是我第一次惹上麻烦, 也绝不是最后一次。我出生的时候, grunge 音乐正在崛起, Courtney Love 的声音伴随着我的童年。青春期对我来说是非常创伤的, 20 年后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当时我公开了自己是跨性别者, Ramones 的音乐被我搁置一旁, 而 Courtney 的强烈和原始的情感却与我的经历息息相关。

她是我在朋克乐中第一次体验到被认可的感觉, 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一丝丝的排斥。我在“Retard Girl”和“Doll Parts”中看到自己的愤怒、性感、非法、神经多样性的少女时期的喜悦和解脱感, 但当提到 Courtney 时, 人们的反应却是强烈的仇恨和恶毒, 这让我感到意外。我以为我们都是怪胎? 但我猜不是那样。我在 2000 年初重新发现了她, 在那时, 人们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 即通过贬低她来获得社会地位。和那些像她一样的人。像我一样的人。我在公共场合穿着 Nirvana 的衬衫, 但只在自己的房间里听 Hole 的音乐。

Courtney Love 在童年时期被诊断为可能患有自闭症, 现在我可以自己身上看到这种特征, 也更容易在别人身上看到它, 一种让人既尴尬又着迷的眼神。人们常说我有漂亮的眼睛, 它们确实很漂亮, 但只有当你认为差异是美丽的时。Courtney 非常漂亮, 以一种非法的工人阶级的方式。她的方下巴和原始的强烈让她不符合任何上流社会的精致美, 即使她瘦、白、金发, 最后富有。她后来尝试软化自己的形象, 但 Love 身上有一种无法控制的东西, 这是她的最佳和最难的品质之一。

我和 Courtney 的相似之处并不多。我在某些方面更能理解 Kurt 的安静、自毁的性格, 但 Courtney 的某些方面让我着迷和羡慕, 由于我的指定性别, 她被认为是我的参照物。她大胆、响亮、无拘无束。是一名演员。我安静、紧张、谨慎。是一名舞台管理员。但我也希望像她一样自由。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非常不舒服, 但她抓住、崇拜和流露了一切我和其他人似乎都讨厌我的东西。朋克乐的两极; 她是一名摇滚明星, 而我最终成为了反法西斯主义者。

我需要在社交场合中 useful, 否则我会感到恐慌。您好! 我可以帮您拿外套吗? 我可以帮您制作饮料吗? 我可以帮您摆放食物吗? 您需要移动家具吗? 我可以按照颜色和质地对您的衣服进行分类! 请为了上帝的爱, 给我一些事情做, 而不是闲聊! 我不是唯一一个有关于在聚会上修理马桶的故事的人, 当我遇到其他这样的人时, 总是感到喜悦和解脱。其他自闭症患者和社会焦虑症患者, 一般来说。那些在这个社会中挣扎于扮演人类的复杂性的人。

我有时会想, 我是否真的算是一个人类。我的一部分希望被视为人类, 但我也希望所有生物都被视为有价值的。也许我不是按照神经典型的人的方式来定义的人类。也许他们会进行基因编码, 发现自闭症患者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人或其他人类祖先的神经类型, 而我们已经将他们杀死和赶尽杀绝。目前有一些令人着迷的研究正在进行, 关于肠道微生物群落如何

影响我们的脑部，包括关于自闭症的研究。令人恐惧的是，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自闭症背后的科学原因，我不希望他们只是完成纳粹开始的工作。让我变得驯服。生命不值得生存。

我的最喜欢的角色是机器人，我从来没有崇拜过女角色或在她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非常喜欢机器人，但我没有意识到这种感觉是代表性，因为这没有意义！他们不是像我一样的人，而且通常是男孩。然后出现了7号机器人女孩，但她也是一个性对象。不允许只是一个机器人女孩，她还必须非常性感。非常令人困惑。那么，如果我也是非常性感的，可以成为一个机器人女孩吗？不，这是一整套暴力。人们对电视上的机器人比对现实生活中的自闭症患者要好得多。观看科幻片的一部分乐趣是，机器人是团队中受重视和珍惜的成员。他们的社交错误被视为讨人喜欢和古怪，并受到同情，而不是被呵斥、扇耳光、制裁、药物、监禁、杀害。事实上，我在童年时期感到非常困惑、内疚、创伤和深深的悲伤。

当然，即使在科幻片中，任何出现情绪崩溃的机器人都会被重置或报废。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未受创伤的自闭症患者，我们的创伤显而易见。我不能简单地被重置，我的系统会定期崩溃。我就像一个具有巨大处理能力的机器人，但它被创伤搞得一团糟，所以我盯着墙壁，就像电影中机器人在解决问题时会冻结和闪烁，但我的问题是所有的事情。朋克摇滚大致上就是我的大脑在齿轮旋转、咬合和处理过多信息时没有足够的发动机油的声音。完美的噪音，可以淹没痛苦和未命名的存在危机。

朋克摇滚是我的精神解脱，因为有人能够表达我的感受，但也是我自残的来源，因为我学会了如何使用朋克摇滚、杂货店和火柴来过载我的感官，从而迫使自己进入关闭状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关闭状态的更危险和更具后果的表亲——崩溃。学习如何避免崩溃无疑让我避免了社会对我们的更严重暴力——精神病院、监狱。但关闭状态是它们自己的暴力。朋克摇滚帮助我保护自己，同时也造成了真正的伤害。

边界是政治上的界限线，它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同时像所有其他法律一样，可以被移动、调整、忽略或强制执行。它们的边缘充满冲突和法律灰色地带，被强者所利用。保护措施在边界管辖区中较弱，容易被丢弃，这些地区充满绝望、希望和死亡。社会边界和规范呈现出同一现象的较小规模版本，社交圈有时表现得像小型民族主义。

我喜欢朋克活动和无政府主义者，但迫切需要一个酷的朋克朋友为我担保，并带我参加活动，所以我与音响技术人员和巡演人员交朋友。当我发现反法西斯主义时，我欣喜若狂，因为我可能找到了进入朋克社区的入口。与纳粹斗争是朋克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的部分，但在互联网时代，反法西斯主义者不仅是光头党，还包括电脑迷。科幻小说迷。书虫。我。朋克摇滚演出的感官过载虽然令人陶醉，但是我只能承受小剂量。然而，我是残疾人，反社会，所以我在电脑上花了很多时间，法西斯主义令人着迷。这是一个新的特殊兴趣，我立即就喜欢上了。

反法西斯主义是我第一次可以肯定地说我不需要场景许可就能参与的活动。在这样一场战斗中划出道德界限是没有道理的，我从来没有如此肯定过自己是对的，即使足以覆盖任何社

交尴尬或恐惧。可能我做过的最朋克的事情就是决定我不需要其他朋克的许可就能成为朋克。我一开始与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互联网互动很棒！也许我找到了我的同类。人们常常不认为我是有趣的，觉得我令人不快或烦人，所以当我被视为有趣和有价值时，总是感到特别。在反法西斯主义中，我找到了具有相同黑暗幽默、病态兴趣和分析、深思熟虑、充满激情的生活方式的人。反法西斯主义亚文化感觉像家——至少有一段时间。

革命一直是极度酷儿和令人困惑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好地处理这种情况。反法西斯主义的不舒服现实是，它是一种紧张的共生关系，包括改造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受欢迎的孩子和怪胎。复仇的书呆子——但也包括运动员，他们是团队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试图融洽相处。许多被遗忘的人长大后变成了健身房老鼠，或者相反，兄弟会中的兄弟们找到了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人们找到自己的力量，尝试新的身份，包括许多有机会完全重塑自己的跨性别者。我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努力打破虐待的循环，不仅是在系统层面上，也是在个人层面上，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们都处于不同的阶段。

一些欺凌者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改造，他们对反法西斯主义的看法仍然依赖于一种酷、强硬的形象，他们不喜欢被与我们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一些人设想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就像一场大规模的足球比赛。我们的队伍与他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需要比他们更强壮、更敏捷、更团结，然后我们会赢。对吗？不。这使得法西斯暴力针对的一些人被置于场外，仅限于为“更有能力”的人或其他什么东西欢呼。事实是，我们在场上，我们擅长于此，不仅仅是无论差异、残疾、女性气质和怪异性，我们的优势正是因为它们。因为这不是足球。

传统的智慧认为自闭症患者有沟通问题，但新的研究表明这是研究中的偏见，我们之间的沟通完全没有问题；只有在不同神经类型之间才会出现问题（Crompton, 2020）。只是神经多样性的人较少。我们中许多人是酷儿、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所以在这些群体中，我更有可能找到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但这并不是保证。此外，许多能够理解这种语言的人选择不这样做，因为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明白，能够与明显的神经多样性的人交谈意味着你自己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当我还是互联网上的幻影时，反法西斯主义者与我相处得很好。再次，当我有了真正的面孔和身体，并带来了自己的偏见时，我遇到了同样的墙壁。我永远不会知道是什么让我成为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但当现实生活中的见面时间到来时，我与之前一样遇到了同样的墙壁。我已经培养了一套全新的技能，并确信这次足够了。我知道如何战斗，我知道该地区每个著名法西斯主义者的名字，我读过所有可用的书籍，我参加过许多活动，我知道所有符号——我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开始工作吧！不。拒绝的理由是……？也许是因为我太像 Courtney Love 了吧。我想知道，当我兴致勃勃地出现时，一些坚定的反种族主义光头党是否问自己：“你认为她只是某天醒来决定要打击纳粹吗？”嗯，差不多吧。这是晚期资本主义，到处都是法西斯主义者。更多的人需要这样做。

当我将反法西斯边界线扩大到包括自己时，很多人非常生气和防御自己的身份，我受到了愤怒、厌恶和轻蔑的对待。在纸面上，没有逻辑上的理由为什么我不应该被包括在内——我穿着黑色衣服，对警察大喊大叫，保护人们免受法西斯主义者的伤害。当镇压来临时，我不可避免地会与他们绑在一起，即使是历史学家、记者或任何外部观察员。这使得一些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并且更加倾向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墙壁，让我承担所有风险，只享受到部分友谊。这不是每个人，但是我根本没想到会有人这样，所以它来的震惊和打击非常巨大。

很难感觉到你认为是自己人的那些人为你感到羞耻。靠近我太近就是靠近荒野，那里真的很奇怪和危险。人们以各种奇怪而悲伤的方式崩溃；从基本无害，只对自己有害，到真正可怕和危险，每个人都可能受到伤害。当谈论社会边缘的时候，你接近这些边缘，但必须小心不要靠太近，以免被吞噬。这至少是一种恐惧。宁愿平静的水域也不愿意激烈波涛拍打岩石。宁愿排除我也不愿意冒着我的存在可能带来的混乱风险。

优生学是如此狡猾。由于希特勒的过度热情，他们不能把我们全部聚集起来毒死我们，但如果我们足够痛苦，我们会为他们自杀。许多朋克乐手都是垃圾、渣滓、弃子、失败者、无用之人，没有未来，准备好并等待死亡。反法西斯主义很难。在被排除在亚文化墙内的任何安慰之外，我有时被迫依赖国家，并在心理健康诊所度过了许多漫长的日子，因为我的大脑和身体在反法西斯工作、误用药物和自闭症倦怠的创伤下崩溃。

在我的一生中，我的痛苦经常被视为欺诈，如果它被看到的话。我有一个比我应该有的更高的疼痛耐受性（身体和情感），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向那些不把你视为人类的人求助是徒劳的。更多的时候，它只会让你受到进一步的攻击。生存斗争往往被旁观者视为戏剧，他们在墙后安全地观看。不相信每天发生在与死亡斗争中的不可思议的行为、勇敢和是的，景象。保持沉默就是死于内心，在攻击下保持沉默就是完全死亡，独自一人，就是放弃，就是不反抗。保持沉默。停止尝试生存。停止反抗。停止这么戏剧化。宁愿安静地死去也不要制造场景。

自闭症患者的自杀率可能高达普通人群的 10 倍，其中女孩尤其受到影响，她们的自杀率是男性的两倍（Furfaro, 2019）。我们甚至没有其他性别的人群数据，而且现有的研究没有考虑到跨性别者的经历。大多数科学仍然是二元性的，这主要归功于纳粹本身及其长期阴影。如果 1933 年世界上最好的性别研究机构 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没有被摧毁，我们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9）。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神经多样性者和跨性别者之间存在着大量重叠，这两组人都有非常高的心理健康问题率（Artz, A., Frazer, C., & Myers-Brooks, K. (2020)), 而且许多人（包括我）同时属于这两组人群。在反法西斯主义者中，这两组人也占有很高比例，因为跨性别者和神经多样性者正在与那些憎恨不能更有效地杀死我们的力量作斗争。

我们的队伍中有很多试图通过警察或纳粹自杀的人，比任何人愿意承认的都要多，因为受苦的神神经多样性者正在寻找一种带有一些尊严感和殉道意味着仍然存在于文化中的出路。死

亡是朋克摇滚永恒存在的一个伴侣。这似乎很多人更尊重库尔特因为他死了，而不是尊重考特尼因为她幸存下来，即使激进圈子似乎也无法摆脱基督教对我们的世界观影响。一部分受洗脑教育的人想成为耶稣，为他人的生命而牺牲自己，而不是共同为所有人的生存而战。

在我从混乱中恢复的过程中，我参加了一个无政府主义会议的工作坊，由一位跨性别非二元人士主持，关于生态过渡带（ecotones），这给了我一个存在的愿景，让我能够抓住并帮助我摆脱绝望。生态过渡带是一个两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紧张区域，由这位美丽、温和的长者完美地体现，他们有着长而闪亮的头发和精致的特征，他们以平静的语气讲述了他们与希腊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工作，这是一个真正血腥和恐怖的场景，金色黎明（Golden Dawn）的崛起意味着街头攻击和谋杀持续了数年。他们鼓励我们关注身份之间的灰色地带，以及欣赏我们像河口一样融合在一起所带来的丰富性。

我已经生活在社会群体之间的灰色地带很长时间了。我认识的大多数有趣的朋友和恋人都生活在边缘。其中一些边缘是危险的，我们中最奇怪的人被推到了可居住空间的极限。我们的疯狂隐喻经常谈论站在悬崖边，但它更像是一个沼泽。人们害怕沼泽，它可能是致命和陌生的，不吸引人，也许有一点臭味，但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安全避难所。沼泽中的陌生感和危险为居住在那里的人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使他们免受外界世界的侵害，而对大多数人类怀有的敌意使得生物多样性得以丰富发展。

人们无法看到沼泽中的美丽，他们不断建造新的、更闪亮的盒子和笼子，而不是冒着自由风险。作为一名非二元人，我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实时发生，因为社会试图为原本应该是摧毁和藐视分类化的一个爆炸创造第三个性别类别。我的医生不断催促我改变我的名字和性别认同，但作为一名反法西斯主义者，我理解分类化会导致什么。我不想要稍微自由一点，更容易居住的地方，我想要完全解放，什么也不缺乏。我不会改变我的合法名字，以便政府可以更好地跟踪我或在我的身份证上有一个 X 符号。我们根本不应该有性别标识符，我们根本不应该有身份证。

我的第一次性别愉悦来自一个袜子木偶账户，其性别我没有确定，但被推特算法和直接消息中的色情机器人假设为男性。这被假设为男性并具有能力给我一种解脱感，同时也让我充分理解了对我的偏见所造成社会限制。这是真的，有些人使用匿名来逃避责任，但对于那些通常面临多种形式偏见的人来说，匿名工作非常自由且具有信息量。我不能夸大被假设为能力强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权。我花费了太多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和悲伤，试图进入门槛，被给予机会，但是负面期望和假设限制使得我无法开始做实际工作。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如今证明我能够改变世界。我开始意识到墙壁并不是围绕其他人的，而是围绕自己的思想。如果他们不想让我进入他们的心墙，那么就不要再进去吧，他们的心墙根本不是真实存在。

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是 Carrie。第一次观看 Carrie 让我产生了很多感受。我被介绍到这部电影作为一部“恐怖”电影，其中 Carrie 是一个怪物，但 1976 年的电影对这个奇怪的女主角充满了爱意。看着她烧毁那个体育馆让我感到非常愉快，对我来说是一种深刻的宣泄，我的其他朋友也告诉我他们有同样的感受。但大多数人并不这样看待，这让我感到震惊和悲伤。这位强大的魔法人物被视为一个杀人狂，毁了一个漂亮女孩试图对她好的人生。好吧，那个女孩也去死吧，她把自己的男朋友借给别人作为某种变态的慈善行为，她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在地狱里腐烂。Carrie 可以用她妈的思想力量移动物体，她不需要你的二手 B 级屌。如果只有 Carrie 能看到这一点。如果只有她能活下来，逃脱，找到像她一样的人。

有时，我觉得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更像运动员孩子，而不是 Carrie，但你宁愿在打击法西斯时有谁在你身边？我宁愿有一百个运动员也不要一个 Carrie。只要让她在国家社会主义黑金属音乐会上放松，看看会发生什么。任何因为我而感到尴尬的人，担心如果品牌因为靠近一群疯狂的弱智女孩而被玷污（好像我们不是最坚韧的混蛋一样），都可以滚蛋。我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无论一些自称品牌仲裁者是否认领我。

人们害怕被归类为暴力和疯狂，但这些都是政治化的类别，包含了一些人类最糟糕的性质，同时也包含了一些最聪明和勇敢的性质。对抗如此强大和根深蒂固的系统是疯狂的。拯救生命往往是一种暴力行为。我的暴力和疯狂已经拯救和改善了許多生命，包括我自己的。

我读到创伤的狗需要被物理地从笼子中拉出来才能开始愈合 (van der Kolk, 2014)，这听起来有点像先锋队，但可以说，自我解放是鼓舞人心的，并且为他人打破墙壁，让他们看到并逃脱。许多人并不真正恨我，他们恨的是我反映回给他们的东西。他们恨的是我揭露了他们的墙壁的无效性。我的感知到的弱点和经历的伤害象征着现代社会的裂缝、不足、恐惧和不公正。我也曾经恨过自己，但现在不再恨了。如果只有两个选择：完全隐形或奇观，我选择两者。在集体中，我是我的生活中不同经验的交响曲的混合体，它解放了我。

朋克摇滚只是我用来生存的一种策略。我需要多种策略和多种人在我的生活中让我留在这里，其他艺术和流派和社区擅长不同类型的支持，因为生活是复杂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不能仅仅以朋克摇滚作为其唯一的文化入口或关怀。朋克摇滚成为前线是因为那是纳粹首先出现的地方，但每个人都需要彼此，并需要差异的光辉、怪胎、笨拙、不同和奇怪的人。我希望那些不喜欢在我身上看到自己的东西的人可以找到我找到的自由，我们可以一起找到解放。他们试图杀死我们，我希望他们停止成功。朋克摇滚教会我不受这些系统的控制，因为控制我就是杀死我，这是我迈向自由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通过墙壁的裂缝，进入边界的废弃之地，那里的警卫不那么警惕，生态系统开始愈合，运动恢复，生物从监禁和排斥中逃脱，新的世界出现。

在逃离我的旧限制和接受我的存在方式时，我最终接近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是那些在墙外的边缘地带感到舒适的人。我喜欢那些喜欢流浪而不是定居的奥格尔斯和先

知，他们不颠倒规则，而是摧毁它们。我们是无法定义的，愤怒的，充满激情的酷儿，最舒适的是在移动中，并且认为安全不在于墙的存在，而在于门和选择离开的能力。我们为边界、窗户、白人和性别的崩溃而欢呼，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陷阱。我们与法西斯主义者战斗，烧毁监狱。我们是善良的，好奇的，深思熟虑的，暴力的和疯狂的。

打破故事，打破墙壁，藐视定义，藐视分类，无处不在，无人不在，人人都是，无人不是。集体是一群蜜蜂，不，它是拿着棒球棒的小丑，不，它是冰淇淋和孩子们的游戏，不，它是枪支和敌意和愤怒和原始情感，不，它是所有颜色和闪光和魔术，不，它是所有黑色和隐身和忍者——它是无性别的，它是多性别的，一切都是，一切都不是。它是社区的一部分，它是独立的，它是无法包含的。它是一个想法，它是一个帮派，它是一个组织，它根本不存在！它很奇怪。它是一个大型酷儿聚会。它很搞笑，它很令人沮丧，它是生活本身的混乱的体现。它是山脉，它是山谷，它是河流，它是海洋，它是沼泽，它是生态过渡带和沙漠和空气和分子和夸克和太空的空虚和太阳的中心。它是无法治理的。它是朋克摇滚，它是民谣，它是爵士，它是说唱，它是狂野地尖叫，它是紧张的沉默，它是混响和碾压和跺脚和歌唱和哭泣。它是我们想要和需要的任何东西。法西斯主义去死吧！摧毁边界！烧毁所有监狱！我们不仅值得生存，而且值得美丽的，丰富的，美味的，解放的生活。我们将建立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生活。

尾注

Crompton, C. J., Ropar, D., Evans-Williams, C. V., Flynn, E. G., & Fletcher-Watson, S. (2020). Autistic peer-to-peer information transfer is highly effective. *Autism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24(7), 1704–1712.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20919286>

Furfaro, H. (2019, August 7). Autistic women twice as likely as autistic men to attempt suicide. *Spectrum | Autism Research News*. <https://www.spectrumnews.org/news/autistic-women-twice-as-likely-as-autistic-men-to-attempt-suicide/>

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9, April 15). 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stitut_f%C3%BCr_Sexualwissenschaft

Artz, A., Frazer, C., & Myers-Brooks, K. (2020). Neurodiversity and the Transgender and Nonbinary Community: Advocacy and Support. <https://www.oerp.pitt.edu/wp-content/uploads/2020/09/Artz-Frazier-Myers-Brooks-Neurodiversity-and-the-Transgender-and-Nonbinary-Community.pdf>

Van Der Kolk, B. (2014).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Mind, brain and bod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uma*. Penguin Books.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moss williams

反法西斯主义、自闭症与朋克乐的边界墙

由 LLM 翻译

2021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moss-williams-antifa-autism-and-the-border-wall-around-punk>

nightfall.buzz